

楊升庵誕辰五百週年

學術論文集

新都楊升庵研究會
新都楊升庵博物館
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SIBN7-5614-0712-2/I·102

定价: 9.00 元

新都杨升庵研究会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主编

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一九九四年·成都



楊少庵誕辰

五百週年紀念

李一龍





四川省新都县升庵桂湖为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字用修,号升庵)的故居花园。图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建于湖上的升庵祠。

目 录

最难能的伟大哲人(代序).....	张秀熟(1)
读杨升庵遗书小札.....	朱季海(5)
杨升庵论学四事	郭诚永(14)
杨慎的古韵学	李运益(27)
杨慎在云南对汉语语言学的贡献	刘冠群(38)
杨升庵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贡献	冯修齐(55)
杨升庵对云南地方志的贡献	杨春茂(65)
论杨升庵哲学思想	张祖涌(71)
论杨升庵的治学	张德全(81)
杨慎反道学	廖远修(91)
杨升庵诗论初探	黄宝华(97)
略谈杨慎的《绝句衍义》.....	王仲镛(110)
杨升庵咏蜀诗刍议.....	李义让(115)
杨升庵吟咏大理诗篇的艺术成就.....	李锡恩(126)
试论杨慎的诗歌创作.....	张建华(138)
杨慎与民间歌谣.....	熊秉尧(144)
杨升庵评点《草堂诗余》杂录.....	白敦仁(148)
升庵词境说.....	刘锋晋(158)
杨夫人词曲真伪辨.....	黄稚荃(166)

《杨太史合编》成书考·····	朱宗尧(170)
四库总目《谢华启秀》提要辨证·····	张志烈(176)
《四库提要》对杨升庵学术论著评论的发覆·····	张德乐(183)
杨慎《赤牋清裁》叙论·····	邓元煊(192)
昆明现存杨慎碑刻·····	王海涛(199)
杨升庵与岫嵊碑·····	丁祖春(205)
杨慎在安宁的题咏·····	谭祖安(209)
杨慎在云南的遗迹考·····	陈廷乐(214)
杨慎与云南民族文化·····	穆 药(235)
升庵先生论书学·····	冯昌敏(247)
杨慎题苏轼《潇湘竹石图卷》考·····	赵永康(259)
杨慎选评诗词·····	何金文(266)
杨升庵著述系年·····	王 炎(272)
试论杨升庵与李白·····	吴明贤(303)
读杨慎《苏祠怀古》札记·····	张忠全(313)
李卓吾与杨升庵·····	姚景民(318)
杨升庵六出北京城·····	周 良(323)

最难能的伟大哲人

(代序)

张秀熟

新都杨慎升庵先生，今年值五百周年诞辰。县党政领导暨民众以先生学术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推第一，其高风亮节尤为后世矜式。拟于名园桂湖，举行纪念，将以广罗当代学者之高文伟论，宏展先哲珂里更高的文明。

我在幼学之年，读经而外，并读升庵《廿一史弹词》。每一朝代开端，都冠有《历代史略词话》，我得粗识历史，又濡染文学。县报恩寺门额“敕修报恩寺”五大字，又传系先生手迹。我于是对先生既景仰而又有亲切之感。及后年龄渐长，问学弥笃，论世知人，首重器识。每览先生言行，辄肃然有敬意。放眼评量，先生之长受世人推崇，首在其具有凛然不可犯的大节。坚持真理，特立独行，不苟同流俗，一身为暴君所弃，而始终眷怀于国家民族。至其著述之富，不为私人，裕后光前，纯为文化，此尤其次焉者。

先生一生之坎坷在议大礼。明代沿袭古训：“为人后者为之子”。非嫡系之宗藩入继大统，即为前代君主之后嗣，而不再

为亲生父之子，亲生父即只能称为皇伯或皇叔，而不能称为皇考。明世宗私欲否定这种礼制，抬高自己亲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为取得一合法地位，利诱威吓群臣改议礼制。这实类于赵高指鹿为马的手法。杨慎仗义直言，与群僚同声反对，至于再，再于三。世宗以为大逞帝王生杀予夺的淫威，即可昭示“礼由朕出”的皇权。而不曾料到慎可与“一杖亡身”之廷杖一杖再杖，终不能改变浩然正气一字之笔削。这实际已不属于议礼范围，分明是一场反皇权的正义斗争。若问升庵先生为如何人？此举为如何事？宋文天祥《正气歌》早流灼见：“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何足论”！过去学者于此多避谈，以为今文古文，礼最难言。誉之者或以为孤忠，怜之者或以为愚忠、愚直，而独不敢触及反皇权的凜然大节。这自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今日纪念先生，于此应特为发皇。

明代自太祖、成祖先后鉴于元末农民起义及“靖难”兵兴遗留的隐忧，决然采取镇压与麻痹双管齐下的手段，谋求政局幸得的安宁。而麻痹之最大方剂莫如宋儒理学之渗透人心。渗透方式又莫如以宋儒之《四书》高头讲章为学问正轨，益以八股文之框架范围人之思维。如此，将可使人民解除一切思想武装，在任何政权下都甘作顺民。王守仁以学者大儒，生当明代中叶，不思挽狂澜于既倒，犹以镇压与麻痹之方策为不足，以尚带“客观”之唯心“理学”为迂缓，进一步提倡纯粹“主观”之“心学”。宇宙万物都由心生，心的作用主宰一切，治心须破心中贼，有心中贼即有山中贼。于是他的“心学”用于政治，便是大量残酷镇压当时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当时的“理学家”桂萼、张璁、方献夫、席书、霍韬辈更假议礼而坚拥皇权。在

这样的理学、心学高压而又麻痹之下，人民只有俯首贴耳，翕然影从。杨升庵独举起针对王守仁辈进行批判的大旗，指斥他们为俗儒、琐儒、儒枭、霸儒：“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自称“吾道学，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无可捉摸以求，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我常慨叹：处于封建时代末期，国运人心一切陷于积弱之明代，不焕发朝气，振作飞扬，而犹高唱宋以来“闲来无事不从容”，“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道学心学诗，此其后果将不堪问。升庵于此时大反心学，如此严肃尖锐，他已不视此只为学术之争，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忧愤。自来批判、反对理学的学者大有人，而升庵在心学风靡、颠侧群论的鼎盛时期，独对之口诛笔伐，有如孟轲之于扬墨，这更是我们应加研讨、深切纪念的。

在明代政治压抑、八股文框架的士风影响下，言为心声，诗坛自不可能涌现出百花齐放、万鸟争鸣的气象。前后七子号称复古，而复古乃是诗必盛唐，盛唐又专推杜甫，甚至张言“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李梦阳、何景明诸巨子公然谓“宋无诗”，“宋人书不必收，诗不必留目”，“不读唐以后书”。这简直把八股文的框架应用到诗上，是诗坛的愚民政策。其割断历史、唯“古”是尚的流毒，岂只等闲。我尝慨叹爱国诗人陆游竟有这样一首诗（《感事示儿孙》）：“人生读书本余事，唯要闭门修孝弟，畜豚种菜养父兄……一字不识勤耕桑”。这样要儿孙不读书，要闭门，要一字不识，比明七子“不读唐以后书”尤为难解。其结果将不但促宋室的灭亡，儿孙且恐不能“家祭勿忘告乃翁”。升庵直接反对诗坛泰斗明七子的诗说，倡言“不可云宋无诗”，并以理论发挥谓：诗“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

后发性情也，以兹知人人有诗，代代有诗”（《李前渠诗引》）。诗风之不兢，反映国势之衰微。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今日纪念升庵，是大大鼓舞人们的。

以上可见升庵谪戍在边荒三十五年，未尝一日消闲。他对当时政治之隆污，学术思想之邪正，文风诗派之升沉，无不非常关怀，凛然以议大礼的精神来批判、驳斥、进行斗争。他这样的高举正是韩昌黎所称“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特立独行”。由此而致力著述一百余种，开拓南天之文化，与各民族谊同骨肉，这是苏武西域十九年持汉节所不能望其项背，东坡在南海诗传农艺亦有逊色。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

杨慎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能的伟大哲人。

1988. 6. 25

读杨升庵遗书小札

朱季海

一九八八年九月下旬新都召开杨升庵学术讨论会，先期以书柬来邀，余既以九月十一日跌损右臂，不果西行。论文属草未竟，爰抽其数篇，以见微意，题曰《小札》，就正大雅。

一曰《滇载记》，升庵自识谓：西南夷滇最大，及张氏受姓，后世迭君长者凡七姓，惟蒙段最大，故著称焉。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於旧家，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稍为删正，其可载者，盖尽此矣。是升庵书原出于滇僰自记也。然其载六诏曰：其一曰蒙舍诏（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诏（今浪穹县），其三曰邓赕诏（今邓川州），其四曰施浪诏（今浪穹县蒙次和之地），其五曰摩些诏（今丽江府），其六曰蒙嵩诏（今建昌）。寻《资治通鉴》云：“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样备，曰越澹”（见开元二十六年），除蒙舍外，其浪穹当即杨记之浪施，或僰人从后名之，其余四诏乃无一名相应。其曰样备者，当以水名，今日漾濞江矣。《通鉴考异》曰：“《新书》六诏曰蒙嵩、越析、浪穹、澄睢、施浪、蒙舍，今从窦滂《云南别录》。新书之六诏，合于杨记者有五，惟彼有越析，盖即窦滂之越析，析析未知孰是。然二家并无

摩些，杨记有此诏，又无越折（析），斯其传闻异辞与？予按刘煦《唐书·南诏蛮传》：“（贞元）七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道出摩些蛮，其魁主潜告吐蕃”，是时去归义既并五诏（六诏合为一诏，刘书在开元二十六年，实公元七三八年）之后已五十二年，而摩些另有魁主，知不在六诏之数，亦未尝称王也。然则尚有一诏，舍窦录之越折（新书作析），故无足以当之也。夔书或出摩些人手，或摩些润色之，越折又微无考，故自名一诏与？张大先人，以无为有，谱谍之常，理或然矣。此一事也。

《载记》又曰：“龙祐那之十六世孙曰张乐进求，逊位于蒙氏，考其时，盖唐世也”，“蒙氏始兴曰细奴罗”，“代张氏立国”，“蒙氏伪称南诏，实唐贞观三年也”，“及高宗时，遣子入侍”。按刘煦《南诏蛮传》“国初有蒙舍庞，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是细奴逻之先，尚有蒙舍龙、迦独庞二世，不见于夔书，则《白》、《玄》二书之传差晚，已莫能稽其远祖矣。然蒙氏父子，以名相属，今可考者，实始于细奴逻，刘出二世父子名初不相属也。夔书缺此二世，又似颇谨严，此二事也。

《载记》又曰：“细奴逻及高宗时遣子入侍，朝命授细奴逻以魏州刺史”。刘传只云：“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而已，既不云细奴逻遣子入侍，亦无授魏州刺史之文。其云遣子入侍，殆即以武后时逻盛来朝而有此异辞尔。其曰魏州之授，或出后世伪传，以为先人壮观云尔。此三事也。

《资治通鉴》：“天宝十载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又云：“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不书日。寻《载记》曰：“天宝十年夏四月庚寅，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命致讨，凤伽异及段俭魏逆战于西洱河，唐兵

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其书庚寅，则唐军大败之日，实壬午战后之第九日。二家各讳其败，而记其胜日，适可互补，合二家之记，乃具得其情，是亦读史者之一快欤？此四事也。

《通鉴》于“仲通仅以身免”下又书“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事其亦见《载记》，文曰：“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为东帝，刻碑国门之外，明叛唐非不得已也，僭国号曰大蒙，始建年号曰赞普钟”，亦书于天宝十年下。然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曰：“后阁罗凤以张虔陀谗构，乃杀之，陷唐鲜于仲通兵，因自结之吐蕃，受钟王，刻石记功，明不得已而改号蒙国大诏，立德化碑，使蜀人郑回制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历元年也”，代宗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去玄宗天宝十载（公元七五一年），已十五年矣。二家之书终言自结吐蕃之故，遂略立碑之年，于文为疏。松年据其所见书之，故得其实，此碑今存，足证《行记》之确（原碑现状具详泰国素察·蒲媚波里叻《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至其考察，则在一九八一年，文见《中外关系史料译丛》一辑二四六页，此五事也。

《载记》文曰：“蒙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为郑氏”，素察文乃云：“蒙氏家族从细奴逻当上南诏的首领算起，至舜化贞止，前后共十三代，历时二百五十三年”（见《译丛》第一辑二四三页）。然杨记以蒙氏称南诏在贞观三年，则是公元六二九年。舜化贞立于昭宗乾宁四年，即公元八九七年，立四年其臣郑买嗣夺之，则昭宗光化三年，公元九百

年也。如比前后止二百七十一年，其云三百十年者，非数字有误，则当上朔蒙舍龙二世而计之。其云二百五十三年者，则细奴逻之立，当在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实公元六四七年，刘书称“国初有蒙舍龙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校以年世，素察所云，似于情事较合，疑得其真耳。此六事也。

若记异牟寻请复号南诏，有曰：“宴使者，出玄宗所赐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惟二人在耳”。是证唐贞元间南诏乐器有龙首琵琶，如龟兹制者（见《新唐书·南蛮传），有自来矣。新书云“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軫柱各三，弦随其数”。近人常任侠谓与印尼之波罗浮屠古刻所见琵琶形状、弦数相同，当是西南海上传来之物，又称大小忽雷正是此制，但皆龙首双弦耳（见常氏《东方艺术丛谈》页二六）。其实南诏之龙首琵琶正来自龟兹，而受之于唐耳。波罗浮屠约建于公元八百年顷（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页五一）。《婆罗浮屠》，差在其后，或二者更有其共同之来源耳。至常氏之发现，自极有价值，且饶趣味，不失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之重要线索也。此七事也。

《载记》记段功事，并录夫人高氏乐府，记阿盖公主事，并录公主愁愤作诗，平章从官粉壁题诗，段宝答梁王书及附诗，平章女僧奴出手绣旗与宝并诗，皆虎虎有生气，可以流芳百世，并赖此书以传，则未知此皆本作梵文，而升庵译之如此，抑原附汉文，而升庵录之也。然《载记》不作，则此诸文不显于世矣。推其阐幽表微之志，则其识语所谓“祖《春秋》而述二司马氏者”，以为作者自道可也。若诸诗乐府并出手译，则越人之歌，不能专美于前已。升庵自署逸史氏，其为《滇程记》，又自拟诸“史氏之足迹”，实有良史之才，而逸在草野，不克成一代之

史，是谁之过欤？此八事也。读此记一过，略出八事，以质知者。

二曰《石鼓文》，石鼓为秦刻石，近人马叔平考论甚详，要其所主，则巩丰说也（见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石鼓为秦刻石考》）。叔平与予并未见原书，知有巩说亦赖升庵言之耳。叔平自注说见杨慎《丹铅录》中，予家旧有明刻《丹铅总录》，弱冠前得诸上海博古斋，抗战时贫无以自存，取以易米久矣。顷乃得之《升庵全集》卷六十二，文曰：“巩丰云：岐本周地，平王东迁以赐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属秦。秦人好田猎，是诗之作，其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为秦物可知。此说有理，予切信之，书之以俟知者”。升庵之言如此，叔平信之，而考之尤详，则升庵之所以待后者不虚矣。顾云“持此说者，仅据器物遗文以立言，不能旁征博引，出入传记，宜此不为世所重”（见马氏《丛稿》页一六八），则升庵既以为有理而切信之矣，可谓不重耶？巩说验之器物而文字是征，考之地理而史实不爽，叔平虽旁征博引，竟未能出其范围，惟岐雍之辨，后出为精。然唐自武德元年改隋扶风郡为岐州，领雍陈仓等六县，天宝元年始复为扶风郡（见刘煦《唐书·地理志》，故窦蒙注《述书赋》，亦云岐州雍城南有猎碣十枚也。以秦受周地为言，言岐可以该雍，巩说亦未为失也。叔平非苟掠美者，或言各有当，不免语有轻重耳。然则升庵之学，虽出入百家，而其要实在于多见守之以卓也。若宋克书《七姬帖》，艺苑所珍，升庵以为明代真行宋克第一，不虚也。其跋是帖则云：“然其事则可疑，七姬之死，盖出于潘之逼云，谓不幸则可，非徇节也。平居则优杂子女而渔纲之；一旦有变，恐乐他人之少年，而雉经之，潘之恶甚矣”。又谓“余旧料其情若此，近观高季迪吊七姬《多

丽》词云：“……忍教受项缠素帛，浑志记臂结红罗……”，其事情信无疑矣，杨说是也。季迪此词见《扣舷集》，可谓诗史。升庵才识超迈，宅心仁厚，乃料得其情如是，则其能多见而守之以卓，不亦宜乎？

三曰《安宁温泉诗序》，《序》称“温泉之在域中，最显名者，新丰之骊山，而泉实不佳，水沸如蒸，难以骤入，硫磺之秽，逆于人鼻，稍不渌治，则穷谷之污，生以青苔，如蛙玼衣”，噫升庵之贬骊泉亦甚矣。然非目验身受者不能道，则其言当不诬。曰此特明之骊汤耳，方唐盛时，华清池水必不如是，姑不具论。一九八三年余有事西安，尝过临潼，登骊山，试汤山下。则单人专室，白瓷瓮池，池水明净，水温适度，绝无硫磺之逆，虽匆匆一浴，而爽适健人，信温泉之美者也。此则升庵所不及知，不可以责古人。夫地质变迁，水温容有高下，至其清浊秽洁，虽由地利，尤关人事矣。沧浪之水，一清一浊，谁昔然矣。偶因升庵之品温泉，有感人文之盛衰，遂备论之。升庵主“代代有诗”（见《李前渠诗引》）是已。然系乎时代，岂独诗兮？虽名山川，亦未尝不兴废随时也，故曰人能弘道，又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四曰《升庵著述序跋》，搜罗之富，体例之精，已为著录之甲观，杨学之司南，然《前言》犹曰“采辑疏漏，请俟拾补”，具见虚怀。今按所收升庵《全蜀艺文志序》“十有八年，辛丑之春编录全志，以艺文委慎”，又云“为卷尚盈七十”也。又收谭言藹《重校全蜀艺文志跋》有云：“顾所修志，今佚不传”，谭跋作于嘉庆十二年，已为此言，是不知天一阁藏书尚在人间也。余读王弘撰《十七帖述》称“杨用修《四川志》只载八帖是与周，则谓此帖皆是与周者，亦不然也”（见《砚山斋杂记》），是杨志三百